

<<中国近代史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中国近代史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1789582

10位ISBN编号：7561789580

出版时间：2011-12

出版时间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吕思勉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中国近代史>>

内容概要

吕思勉是著名的历史学家，在中国通史的构建上做了巨大贡献，同时在近代史的写作上也有开辟之功。

本书从清代早期的社会特征写起，一直写到抗战的结束，举凡近代史的重大事件，重要人物、制度无不细致入微，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佳作。

<<中国近代史>>

作者简介

吕思勉(1884 ~ 1957), 字诚之。

生于江苏常州, 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, 16岁自学古史典籍。

1905年起, 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、江苏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。

1926年起, 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、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。

抗战期间, 归乡闭户著书。

抗战胜利后, 重返光华大学。

1949年后, 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。

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, 知识渊博, 学术造诣高。

在中国通史、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, 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
。

与陈垣、陈寅恪、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。

著作宏富, 有《中国通史》、《白话本国史》、《中国近代史》等。

<<中国近代史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编 中国近世史前编

- 一、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
- 二、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
- 三、中西的初期交涉
- 四、鸦片战争和咸丰戊午、庚申之役
- 五、汉族的光复运动

第二编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

- 一、总论
- 二、中西交涉之初期
- 三、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
- 四、外力侵入时代中国之情形
- 五、变动中之中国
- 六、国民政府之北伐

第三编 中国近代史讲义

- 一、绪论
- 二、中西交通之始
- 三、传教之始
- 四、康雍乾三朝与俄国交涉
- 五、清代之盛衰
- 六、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
- 七、道光以前烟禁
- 八、烧烟及中英战事
- 九、江宁和议
- 十、鸦片战争之役评论
- 十一、五口通商后广东中英交涉
- 十二、咸丰戊午、庚申之役
- 十三、戊午、庚申和约大要
- 十四、中俄咸丰戊午、庚申两约
- 十五、同光中俄交涉
- 十六、嘉道咸同光之朝局
- 十七、各国立约交涉行2
- 十八、革新之渐
- 十九、日本立约及台湾生番事件
- 二十、英人《芝罘条约》
- 二十一、法越之役
- 二十二、英緬之役
- 二十三、英谋西藏
- 二十四、中日之战与马关条约
- 二十五、港湾之租借
- 二十六、戊戌政变及庚子义和团
- 二十七、俄占东三省及日俄之战
- 二十八、清末外交情势
- 二十九、改革政体之动机
- 三十、清之亡及民国成立
- 三十一、民国以来之政局

<<中国近代史>>

- 三十二、民国以来之外交
- 三十三、抗战和建国
- 三十四、“九一八”之役
- 三十五、“七七”及“八一三”之役
- 三十六、东西战事的汇合
- 三十七、战争的胜利
- 三十八、敌寇的降伏
- 三十九、实施宪政和中苏交涉
- 四十、目前的情形和未来的展望

第四编 日俄战争

- 一、东北形势总论
- 二、日俄开战之原因
- 三、日俄战前之交涉
- 四、日俄两国战前之形势
- 五、日俄战事上
- 六、日俄战事下
- 七、日俄和议
- 八、日俄战争与中国之关系
- 九、日俄战役之结果及战后情势之变迁
- 十、结论

第五编 国耻小史

- 一、现在对外情形
- 二、欧洲各国之形势及其东来之历史
- 三、英国两次遣使
- 四、鸦片之输入
- 五、鸦片战争
- 六、广州之役
- 七、京师初陷
- 八、中俄伊犁交涉
- 九、法据安南
- 十、英灭缅甸及暹罗独立
- 十一、中日之战
- 十二、中俄密约及各国租借军港
- 十三、京师再陷
- 十四、日俄之战及朝鲜灭亡
- 十五、英兵入西藏

第六篇 中国近世文化史

- 一、商业篇
- 二、财产篇
- 三、征权篇
- 四、官制篇
- 五、选举篇
- 六、刑法篇
- 七、学校篇

<<中国近代史>>

章节摘录

一、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转变，伟大的转变！

世界上的民族国家为什么会有盛衰兴亡之事？

人必有其所处之境，与其所处之境适宜则兴盛，不适宜则衰亡，这是很容易明白的。

然则人与环境，为什么有适宜不适宜之分呢？

我们知道：动物适应环境的力量，是很小的，它所谓适应，无非是改变自己，以求与所处之境相合，如此，则非待诸遗传上的改变不可，这是何等艰难的事？

人则不然，不但能改变自己，还能改变环境，使与自己适合。

所以人类不但能适应环境，还能控制环境。

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，为之文化。

人类，很难说有无文化的，即在最古的时代，亦是如此。

人类的进化，纯粹是文化进化。

我们现在的社会，和汉唐时代，已经大不相同了，而我们的身体，则和地底下掘出来的几十万年以前的人，并无不同(欧洲考古学家证明古埃及人的体格和现代并无不同)。

不论如何野蛮社会里的人，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会之中，都可以全学会文明社会中人之所能，而无愧色，就是一个确切的证据。

所以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，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优劣。

文化为什么会有优劣呢？

文化本是控制环境的工具，不同的环境，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，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。

文化既经造成以后，就又成为人们最亲切的环境，人们在不同的文化中进化，其结果，自然更其差异了。

文化是无所谓优劣的，各种不同的文化，各适宜于对付各种不同的环境。

但是环境不能无变迁，而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，却变迁得没有这么快。

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，为什么不如环境变迁这么快呢？

那是由于，(一)大多数人，总只会蹈常习故。

审察环境的变迁，而知道控制的方法，不可不随之而变迁的，总只有少数人。

(二)而我们现在社会的组织，没有能划出一部分人，且拣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来，使之研究环境变迁的情形，制定人类控制的方法，使大家遵而行之，而只是蹈常习故(古希腊人有一种理想，以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学家为之，中国古代亦系如此。

《公羊》隐公元年《何注》，说“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”之义道：“《春秋》以元之气，正天之端，以天之端，正王之政，以王之政，正诸侯之即位，以诸侯之即位，正境内之治。

诸侯不上奉王之政，则不得即位，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，政不由王出，则不得为政，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。

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，故先言春而后言王，天不深正其元，则不能成其化，故先言元而后言春，王者同日并见，相须成体，乃天人之大本，不可不察也。

”此谓王者应根据最高的原理，制为定法，以治天下，其说原无误繆。

但在小国寡民之世，事务简单，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。

在广土众民之世，就断无法悉知悉见了，悉知尚且不能，何况加以研究，而制定适当的处置方法？

所以古人希望有一个圣人出来，对于一切事情，无不明白，因而能指示众人以适当处置的方法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。

但一人之智不及此，合众人而共同研究，则不能谓其智不及此，我们的误繆，在于(一)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万古不变之道，此道昔人业已发现，我们只要遵而行之，遂不复从事于研究。

(二)处事之时，亦不肯注重于研究。

即或迫于事势，不得不加以研究，而研究的人数，既苦于不足，其人选又不适宜。

所以社会科学的道理，迄今多黯然而不明。

现代科学的研究，不合理想的地方还很多，因其规模比较大，研究的人数比较多，人选亦比较适宜，

<<中国近代史>>

其成绩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语了。

所以治世的方法，并非不可发现的，不过人们现在的所为，不足以语于此)。

于是环境变迁了，人还是茫然不觉。

(三)虽然没有能够推出一部分人来，使之从事于研究环境的情形，以定众人行为的方针，然事实上总有处于领导地位的人。

这种人，往往头脑顽固，而且其利益，往往和大众及全体冲突，以全体的利益论，在某时代，适宜于改行新制度(制度二字，旧时多就政治方面言，此处所用，兼该社会的规则。

所谓环境，实有两方面：一为自然，一即社会，可谓人类的自身。

制度即人类所以控制自己的)。

而这种人的私利，都是藉旧制度为护持的。

因为和其私利冲突，新制度，即适宜于控制环境的方法，往往为此等人所反对。

甚至知识为利欲所蔽，连此等新制度的适宜，他也不知道了，而真以旧制度为适宜，遂至尽力以反对新制度，保存旧制度。

因为此等人，在社会上是有分子，人们要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，就成为非常艰难的事，因为先要对付反对改变的人。

如此，人们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，就往往要成为革命行为，这是何等艰难的事？

文化的兴起，本是所以应付自然的。

在最初的一刹那间，所谓环境，其中本只包含自然的成分(此就理论上言)。

但是到文化兴起以后，文化就成为环境中的一个因素了，而且较诸自然的因素更为重要。

因为自然的变迁是缓慢的，在短期内不会使人们有大变其控制方法的必要。

人为的因素则不然，其变迁往往甚剧，迫令人们非改变其方法不可。

能改变则更臻兴盛，不能改变则日就衰亡，大概都是这种因素。

文化是有传播性质的，即甲社会控制环境的方法，可以为乙社会所仿效，乙社会之方法，可为甲社会所仿效亦然。

此其相互之间，较优的社会，往往欣然愿意指导较劣的社会，而较劣的社会，亦恒欣然乐于接受。

此等现象的由来，我们除掉说：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，别无解释的方法。

人心之不可改变，等于人体之不可改变(心理是根于生理的，其实二者原系一事)。

要使人不爱人，人不求善，正和不许人直立而使之倒悬一样的难。

如此，世界上各地方各种不同的文化，就应当迅速的互相传播，各地方很快的风同道一；而全人类的文化，也因之日进无疆了。

然而不能不为前述的原因所阻碍。

因此，各民族国家的文化，就不能无适宜与不适宜之分，因而生出盛衰兴亡之事。

当盛衰兴亡，迫于眉睫，非大改变其文化，不能控制环境，以谋兴盛而避衰亡之时，其能否改变，改变之速度，能否与环境的变迁相应(所谓能否改变，其实就是速度能否相应的问题)。

若不环境所迫而至于衰亡，时间尽着延长，是没有什么民族，能断言其不会改变的)，仍看其本来文化的高低。

因为自然的环境，不会急变，急变的总是人造出来的环境。

所以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环境的剧变，恒在与一个向不交通的区域交通之时。

这所谓交通，非普通所谓往来之义。

世界上无论如何隔绝的区域，和别一区域直接或间接的往来，怕总是有的，但是此等偶尔的往来，并不能使该区域中的文化，发生需要改变的情形，便非我在此地所说的交通。

我在此地所说的交通，乃指因两造的往来，使其中的两造或一造，所处的环境，为之改变，达于非改变控制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。

不达于此程度，虽日日往来，亦不相干。

准此以谈，则中国的文化，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：即1．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。

2．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。

3．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。

<<中国近代史>>

第一时期的界限，截至新室灭亡以前，寻常都以秦的统一为古今的大界，其实这是表面上的事情。

若从根本上讲，则社会组织的关系，实远较政治组织为大。

中国在古代，本有一种部族公产的组织，其部族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，都极为安和，此种文化，因交通范围的扩大，各部族的互相合并而破坏了。

但其和亲康乐的情形，永为后世所追慕，而想要恢复他，因为昔人不明于社会组织的原理，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，因此，自东周至前汉之末，此种运动垂六七百年(此不过约略之辞，实际上此等运动，或更早于此，亦未可知。

不过在西周以前，史料缺乏，无可征信罢了)，而终于无成。

自新室的革命失败以后，我们遂认现社会的组织是天经地义而不可变。

不以为社会的组织，能影响于人心，反以为人心的观念，实造成社会的组织，遂专向人的观念上去求改良。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印度的哲学思想，是颇为精深的；其宗教感情，亦极浓厚；适合我们此时的脾胃，遂先后输入，与中国固有的哲学宗教，合同而化，而成为中国的所谓佛教。

发达到后来，离现实太远了，于是有宋朝的理学，欲起而矫其弊。

然其第一时期以观念为根本，第二时期承认现社会的组织为天经地义，还是一样的。

所以理学代佛学，在社会上并不起什么变化。

近几百年来，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，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。

其结果，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，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。

其影响亦及于中国。

中国在受印度影响的时代，因其影响专于学术思想方面，和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没有什么直接的紧迫的关系。

到现在，就大不相同了。

交通是无法可以阻止的，最小的部族为什么要进为统一的大国？

统一以后，为什么还要与域外之国相往来，都是受这一个原理的支配。

既和异国异族相交通，决没有法子使环境不改变，环境既改变，非改变控制的方法，断无以求兴盛而避衰亡。

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，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。

而我国在受着此新影响之后，亦时时在改变之中，迄于今而犹未已。

转变，伟大的转变！

<<中国近代史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论方面广阔，述作宏富，且能深入为文者，我常推重吕思勉（诚之）先生、陈垣（援庵）先生、陈寅恪先生与钱穆（宾四）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。

——严耕望 吕思勉是著名的历史学家，在中国通史的构建上做了巨大贡献，同时在近代史的写作上也有开辟之功。

<<中国近代史>>

编辑推荐

《中国近代史(1840-1949)》编辑推荐：史学大家吕思勉最经典最客观的中国近代史，吕思勉、钱穆，陈寅恪、陈垣并称史学四大家，中国人不能不知道的中国近代史。一是传承传统的史学理念，鉴往世兴衰，考当今得失，因此著史特别有时代感，总是立足于当下，阐述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；二是立足于客观的情势，同情地理解历史中的人物事件，揭示历史不得不如此的必然性，不求全责备，也不拔高历史人物，因此显得客观公允。他的书是我们客观地了解中国历史的最佳读物。

<<中国近代史>>

名人推荐

论方面广阔，述作宏富，且能深入为文者，我常推重吕思勉（诚之）先生、陈垣（援庵）先生、陈寅恪先生与钱穆（宾四）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。

——严耕望

<<中国近代史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